

试论汪笑侬诗歌和剧作的爱国思想

赵旭¹ 穆琳²

(1. 沈阳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41)

2.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2)

摘要:汪笑侬的诗歌和京剧作品中具有密切关注时局,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;主张团结御侮,明确的“大中华”意识;紧随时代步伐,积极的爱国民主意识等特点。他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,由拥护改良而进步为赞同民主革命,并通过自己的诗作和京剧改革实践宣传爱国思想,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。

关键词:汪笑侬;爱国思想;忧国忧民中华;民主

清朝末期,内忧外患,救国图存成为社会主要思潮。对文学而言,“求新,求变,求用是中国近代各派倾向进步的文学家的共识,实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,即所谓近代意识。”^[1]爱国的文人更是能够不断超越自身局限,积极投入到爱国大潮中去。著名京剧改革家汪笑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汪笑侬,满洲正黄旗人,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之家。他生活的年代(1858—1918),正是中国社会异常黑暗而又酝酿着大变革的时代。“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存亡之际,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,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经验,强调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,认为戏剧是一种有广泛群众性的文艺样式,主张用它作为启迪民智、改造社会的手段,因此发起了一场戏曲改良运动。”^[2]而“京剧界最早从事改良实践的是艺人兼文人的汪笑侬。”^[3]他自己在《自题画像》诗中说道:“手挽颓风大改良,靡音曼调变洋洋。化身千万倘如愿,一处歌台一老汪。”表现出对戏剧改良运动的极大勇气和信心。为宣传爱国思想,推动民族的觉醒与自强,促进社会的革新与进步,他积极对古今中外的题材进行改编,创作隐刺时局的新剧,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和革命宣传活动,这是他最大的功绩。早在梁启超提出戏曲改良的主张之前,汪笑侬就改编了清人丘园的同名传奇,上演了《党人碑》,赞扬为寻求救国之路而献身的戊戌六君子;1903年创作了以刺秦王为背景的《博浪锥》;在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,他编演了《瓜种兰因》等剧目,借波兰亡国的史实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;1904年汪笑侬又和南社爱国作家陈去病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剧刊物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,他在题词中写道:“历史四千年,成败如目睹。同是戏中人,跳上舞台舞。”指出舞台是历史缩影,能够通过它来观照社会人生。在另一首题词中又说:“隐操教化权,借作兴亡表。世界一戏场,犹嫌舞台小。”强调了戏剧的教化功能。因此,

蔡元培等人主编的《警钟日报》称他是“演剧改良之开山”,同盟会的机关报《中国日报》称他的剧作“使阅者惊心动魄,视听为之一变。”^[4]更有人称他“为社会之大改革家,而论功不在禹下矣。”^[5]汪笑侬始终以传播爱国思想为己任,逝世后被称作“伶圣”,观其一生,汪笑侬当得起这一称谓。

汪笑侬将受到大众普遍喜爱的京剧作为教育民众,宣传爱国思想的重要手段,其剧作“以新戏改良,处处刺激国人之脑”;同时,他的诗作也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。综观汪笑侬的剧作和诗作,其爱国思想突出地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:

第一,密切关注时局,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。甲午战争失败,举国震惊。在台湾,刘永福等人成立共和国,喊出“愿人人战死以失台,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”的口号;在北京,康有为发起了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;小说家也创作出《台战演义》和《台湾巾帼英雄传》等时事小说。此时,汪笑侬虽然离开了官场,但仍密切关注着时局。他的许多诗歌可以作为时事评论看,如《时局》:“黄蜂乱啄□□飞,青草食残羊尽肥。烈日总能清雨露,流云无复恋斜晖。事齐事楚终无定,逃墨逃杨两不归。政教可怜难自保,中原时事已全非。”勾勒出一幅岌岌可危的中国时局图;在《与日本二侨君论中国内政外交之失败诗以应之》中,他说:“国非对待无公法,最后其如强硬何?利原在权权在力,守方能战战能和。”一针见血地指出弱国无外交的事实;在《又论中国之现象并以诗答之》中指出:“暮气已深日将没,前途危险尚迟迟。瓜分谁肯留瓜种,煮豆可怜燃豆萁。四百兆心容易死,五千余岁体难支。无端乱用虎狼药,断送生机是此医。”这是对“老大帝国”各种弊端的清算,很有针对性。然而,统治者“大梦沉沉终不悟,千呼万唤总徒然。”(《大梦二首》)汪笑侬在《冷笑二首》自记中说:“因怆怀乱世,惊心前途而成。此时何暇笑,而何以独能笑?乃又不能不笑,

作者简介:1.赵旭,男,沈阳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,文学博士。2.穆琳,女,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,文学硕士。

盖欲哭而哭不出耳。”这种欲哭反笑的尴尬正是内心痛苦的表现。痛定思痛后,他积极寻求救国之路,高呼“中国非无独立性,误于历史四千年。”(《愤时》)“自由若背服从义,数遍中原尽主人。”(《题和平救国不二策八首》)希望唤醒民众。他所身体力行的戏剧改革也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。其剧中,对亡国惨状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在《哭祖庙》中,唱词极有针对性,如“自古以来哪里有将大好的江山,白送人家的道理!”“今日的堂堂天子尚称朕,明朝就是亡国君。”“恨不得乱臣贼子刀刀斩,从今后不要再要凤子龙孙自命不凡。”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,尤其是刘谦的唱词,在八十多句【反二簧】中,首先追述了先祖打天下的艰难,然后怒斥“昏昏沉沉睡梦间,直到如今睡了几十年”的皇帝和“不敢开战”的满朝文武,最后描画出“匍匐尘埃投那邓艾”的亡国惨状,将一腔怨愤唱得淋漓尽致,引起人们对时局的联想和极大的共鸣。剧中一句“想我国破家亡,死了倒也干净”,一时成了观众们议论时局的口头禅。《耕尘会剧话》形容汪笑侬的演出说:“檀板一响,凄凉幽郁,茫茫大千,几无托足之地。出愁暗恨,触绪纷来,低回咽泪,慷慨淋漓,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叠盘托出,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。笑侬殆以歌场为痛苦之地者也。”非常形象地描述出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。

第二、主张团结御侮,具有明确的“大中华”意识。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崩溃,各种党派学说纷起,在促进解放思想的同时,也造成了一定的动荡。对此,汪笑侬认为时局的稳定,政权的统一是救国保种的重要前提,所以主张放弃门户之见,共御外侮,表现出“大中华”意识。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,这一主张显然是很有意义的。当时的政局十分混乱,正如他在《冷笑二首》中所描绘的:“跳出伦常尽有天,父兄师保尽无权”,“危堂燕子犹相斗,大厦将倾在眼前。”国家的混乱势必会让敌人乘虚而入。他在《自题<瓜种兰因>新戏五首》中指出:“尚有国旗在世上,几分权利或能争。一朝树倒猢猻散,再想猢猻弄不成。”又说“多少人才难救国,却因众志未成城。一家犹自分门户,无怪强邻界限争。”本着这一思想,汪笑侬对起义军领袖张献忠、李自成、洪秀全、杨秀清都予以否定,认为他们的起义打破了稳定的统治秩序,所谓“若无张李明犹帝,纵有洪杨汉亦奴”;对于主张政治改良的康有为和倡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也颇有微词,以为“孙康未必是英雄”,因为“先生能乱不能治,爆裂中原顷刻中。”这固然是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,但从“能乱不能治”的角度提出,却是同他的维护稳定,共御外侮的“大中华”意识相一致的。

第三、紧随时代步伐,具有积极的爱国民主意识。汪笑侬早

年受康有为、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影响,希望能够对满清政权进行改良。在汪笑侬看来,政局的败坏责任主要在于权臣奸佞,犹如《受禅台》中逼迫汉帝让位的华歆、《刀劈三关》中通敌卖国的郭章、《党人碑》中迫害忠良的蔡京等,所以给予了猛烈的抨击。其中《骂王朗》的【二六】骂得最是痛快:“王朗你本是汉老臣,食君之禄当报国恩。匡扶汉室你全不论,兴刘安汉心无分毫。助纣为虐篡了汉鼎,甘心愿为谄媚臣……”而对于开明的君主他却是赞成的。如在京剧《战蚩尤》中,他赞扬黄帝是一位贤德的君主,“自登基以来,创立甲子,振兴文化,制造兵戈以修武备,政教大昌,天下太平。”在《煤山恨》中对亡国的崇祯帝满怀同情,尤其对他临死前留血诏给李自成要他“宁可问我儿子罪,千万莫害众黎民”的行为给予了肯定。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,血的教训促使他去寻求新的救国道路。谭嗣同留下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豪言走向刑场,汪笑侬则发出“他自仰天长笑,我却长歌当哭”的悲叹。在《洗耳记》中,他明确表现出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态度,借剧中许由的口抨击这皇位“以一人压天下原非正道,到后来祸临头公理不饶。”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,他更是在《博浪锥》中借张良之口唱出:“我想把好乾坤重新构造,我想把专制君万剐千刀”,呼唤着“国民起义师恭行天讨”,对君主制度猛烈开火。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,他更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,1905年在上海春仙茶园排演《波兰亡国惨》时与熊文通共同致书给曾少卿说:“抵制风潮现正吃紧,孝农等爰排一戏名曰《苦旅行》,取波兰遗事,内容甚富,表明不爱国之恶果……相形之下,足见我国民非劣种,实有优胜之资格,大有可为。”在《闻拒约》诗中他更加欢欣鼓舞地写道:“入耳多少伤心事,这番团结竟成城。一声怒吼睡狮醒,三载惊闻大鸟鸣。民气本来大可用,商权此后或能争。聚金我欲铸青铜,留与同胞共感情。”对人民的力量充满信心洋溢于诗中。

汪笑侬作为一位满族作家,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,由拥护改良而进步为赞同民主革命,并通过自己的诗作和京剧改革实践来宣传爱国思想,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。汪笑侬的一生表明,他是一个始终进步着的爱国文人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吴组缃、季镇淮、陈则光.中国近代文学鸟瞰.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.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9年9月版第3页
- [2][3]张庚、黄菊盛.近代戏剧的革新运动.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.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9年9月版第162、163、165页
- [4]陈去病.致汪笑侬书.中国京剧史(上卷).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8年版第311页

责任编辑/世杰